

学 | 术 | 史 | 丛 | 书

〔日〕平田昌司 著

文化制度和 汉语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学 | 术 | 史 | 丛 | 书

〔日〕平田昌司 著

文化制度和 汉语史

学苑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204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制度和汉语史/(日)平田昌司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8
(学术史丛书)

ISBN 978-7-301-26970-1

I. ①文… II. ①平… III. ①汉语史—研究 IV. ①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0700 号

本书的中文版权归北京大学出版社所有

书 名	文化制度和汉语史 WENHUA ZHIDU HE HANYU SHI
著作责任者	〔日〕平田昌司 著
责任编辑	张弘泓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970-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s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22 印张 327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学术史丛书”总序

陈平原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其实,此举并非今人的独创。起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已着先鞭,更不要说梁启超、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于国外,同类著述也并不少见,单以近年译成中文的为例,便有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尼古拉耶夫等的《俄国文艺学史》、勒高夫等的《新史学》,以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

即使如此,九十年代中国学人之热衷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

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当初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只是其拟想中的《中国学术史》之第五种;今人之谈论“学术史”,自然也不会以“二十世纪”自限。本丛书不只要求打通古今,更希望兼及中外——当然,这指的是丛书范围,而不是著述体例。

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1998年8月4日

前言

所谓“汉语”有哪些特点？桥本万太郎（1932—1987）曾指出，最常见的说法是：（1）单音节语言、（2）没有词汇内部形态变化的孤立语、（3）词汇的语法功能完全依赖词序决定、（4）声调语言、（5）名词和量词有固定的搭配关系，等等。桥本先生还指出，这几项都是对语言表层特点的轻描淡写而已，同样可以适用于泰语、越南语，并不能说成汉语的特征^①。如此说破，汉语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使人立即陷入扑朔迷离之中。

窃以为，汉语很突出的特点可能仅有一个：坚持全用汉字书写的原则，拒斥其他文字进入中文的体系里^②，正字意识十分明确。1931年，郭沫若论东周列国金文指出：“自春秋而后，氏族畛域渐就混同，文化色彩亦渐趋画一，证诸彝铭，则北自燕晋，南迄徐吴，东自齐邾，西迄秦郢，构思既见从同，用韵亦复一致，是足征周末之中州确已有‘书同文，行同伦’之实际。未几至嬴秦而一统，势所必然也。”^③虽然二十世纪以来陆续发现的楚竹书所见谐声、通假字、异体字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战国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④的本来面

① 桥本万太郎《中国语の特色》，1974年，载《桥本万太郎著作集（1）》，东京：内山书店，2000年。

② 有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八思巴文、满文等文字，但跟汉字混用的情形很少。

③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东京：文求堂书店，1932年。七十多年以后，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总结中国考古学的成果指出，周代礼制很早通过两种途径传播到四夷的边缘地区；其一是从中心区域往外迁徙的移民，其二是原来属于“非一周”类型的族群接受周朝类型的宗族编制对自己的社会结构进行了重组。例如：根据出土遗物判断，东周时期的秦国社会完全接受了周人的社会模式；战国时代的中山是狄人集团统治的国家，但其文化、知识模式完全属于周文化的主流；楚国也跟秦国相似，其文字文献、政治制度、物质文化、社会组织，跟中原地区相当接近（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p. 242, p. 244, p. 254, p. 256, pp. 264-265）。

④ 《说文解字》卷一五上，四部丛刊缩本第129页上。

目,但文本的语法结构或词汇用法跟传世文献没有多少差异^①,可见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书写语言。秦始皇刻石(前219—前210)是中国最早的“国家语言”,把小篆字体昭示于帝国的东方边疆——峯山、泰山、琅邪、之罘、东观、碣石、会稽^②。

跟向心力较强的文字规范不同,春秋以来的列国口语有不少分歧。松江崇依据西汉末年的扬雄《方言》归纳汉代方言词同言线束^③指出,在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以‘周韩郑’地区为中心,其西北部的‘秦晋’和其东部的‘魏宋鲁卫’”“在‘魏宋鲁卫’东部的东齐海岱地区,与其西部”都呈现出东西对立。此外,在黄河以北地区“‘秦晋’和‘代(赵)’之间”,在淮河中下游“‘江淮—宋’‘江淮—海岱’之间”,在长江以南地区“‘楚—南楚’之间”,分别存在较大规模的同言线束^④。这情况让我们想到《孟子·滕文公下》里的一则有名寓言:“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⑤据扬雄《方言》给我们提示的语言事实推断,所谓齐语与楚语的差异可能包括最常

① 有些虚词、句法似乎反映地方性的语言差异。宫岛和也《战国楚·秦における前置词“于”“於”をめぐって》(《中国语学》262,日本中国语学会,2015)指出,战国简帛中表示方位格的介词,楚系资料几乎全用“於”,而秦系资料混用“于”“於”。

② 秦刻石的用韵,之职部、鱼阳部用得非常频繁:峯山刻石(阳部、之部)、泰山刻石(职部、之部)、琅邪台刻石(之部、佳部、阳部、鱼部)、之罘刻石(之部、职部)、东观刻石(阳部、之部)、碣石刻石(职部、阳部、鱼部)、会稽刻石(阳部、耕部)。蒋经魁《秦东巡刻石考述》(《驻马店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秦始皇“崇尚水德和‘数以六为纪’,几乎反映到各个方面”,“刻石的字数、韵数皆与六相符”,程章灿《传统、礼仪与文本——秦始皇东巡刻石的文化史意义》(《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也肯定蒋氏的说法。秦始皇刻石当时起了正字(让东方地域认识到小篆字体)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

③ 松江崇《汉代方言中的同言线束——也谈根据〈方言〉的方言区划论》,参看华学诚等《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据松江崇的定义,同言线是“以某个语言特征A,划分其分布的领域与不分布的领域的一条线”。如果出现大规模的同言线束,相邻两个地区之间的语言断绝性比较明显。

④ 松江崇《汉代方言中的同言线束》,第1527—1530页。

⑤ 阮元刻本《孟子注疏》卷六上,页十二至十三(《十三经注疏》第八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3年,第112页下—113页上)。

用的口语词汇在内,并不是单纯的口音特征。

书写语言的统一性、各地口语的多样性,在这两种情形兼存的前提下,不同区域间的口头交际成为问题。这时候,《诗》《书》、汉字成为东周列国的卿大夫——无论是华夏、四夷——能够自由运用的文化资本。《左传》襄公十四年(前559),鲁、晋、齐、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邾、吴的十四国会盟于向,姜戎(西戎)首领驹支也过来参加。晋国范宣子担心驹支是异族,有可能对外泄漏晋国的机密,要求他不参与会盟。驹支立即反驳范宣子说:姜戎曾被秦人驱逐离开瓜州^①之地,晋惠公夷吾(前650—前637)让他们定居在晋国南鄙的荒野,之后姜戎一直为晋国提供军役,岂敢叛离。驹支最后强调:

“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瞽焉。”赋《青蝇》而退。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②

如果相信这段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的语言生活,当时在晋国南部有不少姜戎移民^③,他们的语言跟华人不能沟通——“言语不达”^④。而且自称“诸戎”的驹支居然能背诵《诗经·小雅·甫田之什·青蝇》的“岂弟君子,无信谗言”,使得范宣子听到诗句后立即向他道歉。在《左传》作者的想象中,姜戎的贵族阶层不仅能够运用戎华双语,还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另外,《孟子·滕文公下》提到楚人陈良的文化身份彻底地

① 据顾颉刚的考证,瓜州“在关中·秦岭一带”(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第50页)。顾氏的推论过程不无问题,但至少可以肯定瓜州“必不在今敦煌”。

② 《春秋左氏传注疏》卷三二,页八(《十三经注疏》第六册,第557页)。

③ 西汉末年以来,大量戎狄迁居到现在的晋、陕地区,西晋的郭钦、何统等人先后提出了徙戎的建议(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85—93页)。从《左传》中范宣子与驹支的对话看来,西戎入居晋南地区的年代很早。

④ 竹添光鸿以为“言语不达”并不是语言不通。《左氏会笺》卷一五:“雅,騞或有不相晓者,故极言之也。其实戎子岂以象胥通言乎!”(《汉文大系》第11卷,东京:富山房,1910年)。另外还不能排除晋国范宣子兼通姜戎语的可能性,春秋时代的晋人应该有不少双语者、多语者。如众所周知,晋国的惠公夷吾跟文公重耳是同父异母,他们的母亲是翟(狄)人血统的亲姊妹。

“北方”化的例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①。假定(1)春秋战国的中原地区存在一种文学语言，“中华”凭它形成了一个跨越方言、跨越族群的共同体；(2)非中原出身的贵族以及从事跨地域贸易的商人阶层都具有双语、多语的能力——我们不妨想起当代欧洲的精英阶层——的话，以上情形应该能够得到解释。

社会阶层	口语	书面语	社会阶层	口语	书面语
华夏贵族	华夏通语	“书同文”	戎狄贵族	华夏通语	“书同文”
华夏平民	华夏方言		戎狄平民	戎狄语言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②(《礼记·王制》)，“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③(《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可见在周末秦初的理想中，中原“方三千里”的范围^④不用通译官(寄、象、狄鞮、译)能直接通话。不过，一旦开始探讨标准口语问题，我们很快就会陷入困境。强势口头语言的通行范围不小，但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中几乎找不到有关正音的记载，连零星记载也极为少见。中国最早的口语正音书也许要等到《隋书·经籍志一》所记录的佚书王长孙(疑是北朝人)《河洛语音》^⑤。

汉人与周边民族比较系统地认识到对方语言的特点，从佛教的东传开始。据南朝梁慧皎有关历代译经僧的评论，安世高、支娄迦谶、康僧会、竺法

① 《孟子注疏》卷五下，页四(《十三经注疏》第八册，第98页)。

② 《礼记注疏》卷一二，页二十七(《十三经注疏》第五册，第248页上)。

③ 《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119页上。

④ 在汉代人的观念中，“方三千里”不一定指东西三千里、南北三千里的范围，可指总面积九百万平方公里。班固《汉书·地理志下》认为，周国的京畿方千里，“初洛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50页)。

⑤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45页。

护等所翻的二至三世纪译经,因“夷夏不同,音韵殊隔,自非精括音训,领会良难”,而支谦、聂承远、竺佛念、释宝云(?—449)、竺叔兰、无罗叉等三至五世纪时代的译经人士都“妙善梵汉之音,故能尽翻译之致,一言三复,词旨分明,然后更用此土官商,饰以成制”^①。之前,汉人仅靠四言、五言等定言诗体、句末押韵、双声叠韵等技巧,完成了内容丰富、变化多端的先秦两汉魏晋抒情诗。可是,在翻译佛经的过程,汉人逐步地认识到梵文佛经偈颂把音节长(guru重)短(laghu轻)搭配而成句,同时还了解到“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官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啰也”^②。中国传统诗体无法满足梵文格律的精妙要求,西天僧人听到汉译偈颂竟然觉得恶心、想呕吐——对中国文人来说,这评语是对母语文学的否定,露出了已有的格律难以逾越的局限性,该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们开始自觉地 从诗歌作品中理出音高、抑扬等因素归纳为四声,并试图把这些知识应用到五言诗去形成新的诗律体系,最后让它定型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声病,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假设。在接受印度文化的过程出现的谢灵运(385—433)《十四音训叙》是汉人分析外国语言的早期著作^③。语言的对比研究让汉人加深对母语的自我认识,到南齐永明年间(483—493),周顒、沈约(441—513)等人开始提倡四声论,“文皆用官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④,形成了五言诗的声韵调搭配模式。当时陆厥批评沈约说:“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官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⑤钟嵘也说,“自古以

① 《高僧传》卷三(《大正藏》卷五〇,第345页下)。

② 《高僧传》卷二(《大正藏》卷五〇,第332页中)。

③ 平田昌司《谢灵运〈十四音训叙〉の系谱》,载高田时雄编《中国语史の资料と方法》,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年;王邦维《谢灵运〈十四音训叙〉辑考》,《国学研究》第三卷,1995年,修订版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语言文学献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④ 《南齐书·陆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98页。

⑤ 《南齐书·陆厥传》,第899页。

来,不闻官商之辨,四声之论。……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①其实沈约创始声律论的意图就在于“贵其如一”,只要遵守四声论的规则,任何人都能实现声韵调搭配的理想化、标准化、均一化,即五言诗格律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为了达成诗歌格律的标准化,文人群体需要确定一部大家共同承认的游戏规则(正音规范)——韵书,否则无法知道某个字的声韵调,也就无法判断某首诗是否符合四声论的要求。

随着南朝隋唐“以文取人”的风气,代表诗赋格律的隋人陆法言《切韵》及其后裔(《广韵》《韵略》《集韵》《礼部韵略》等)成为官韵的过程,在第二章有叙述,兹不重复。问题是,这正音规范能否包容各地方言音系的多样性,是否代表强势口头语言?《切韵》成书于“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②的文化窘境,有无资格代表中华正音比较容易受到质疑。例如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韵补》条针对《切韵》有如下评语:

韵书肇于陆法言,于是有音同韵异,若东冬钟、鱼虞模、庚耕清青登蒸之类,断断乎不可以相杂。若此者,岂惟古书未之有,汉魏以前亦未之有也。^③

《切韵》这些分韵确实反映从上古至中古的汉语音系积累下来的一些层次,决不能说成“古书未之有,汉魏以前亦未之有”。由于经过音变的晚唐五代两宋时期中原主流汉语已经无法区分东冬钟、鱼虞、庚耕、清青之类的韵部,一般士人误以为这些都是陆法言的方音或者强生区别的“音同韵异”,因而《切韵》的正统性不断受到质疑。在中唐以后的复古思潮中,有些儒士呼吁放弃《切韵》,恢复三代雅音,这是必然的趋势。可是,在野的批评

① 陈延杰注《诗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4—5页。

② 韩愈《原道》,《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一一,四部丛刊缩本第95页下。按,《切韵》取舍五家韵书(西晋吕静《韵集》、梁夏侯该《韵略》、北齐阳休之《韵略》、宋李季节《音谱》、北齐杜台卿《韵略》)的不同而成,综合了西晋南北朝的正音观念。

③ 《郡斋读书志 直斋书录解题》,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年,第477页上。

声音再大,官韵的权威性到近代都没有动摇过。隋唐五代宋元辽金元明清,在这长达一千三百年的期间,为了维持“思想/想象的共同体”和“知识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Letters)”一直运作的机制就是科举制度,在朝廷管理这机制的是国子监和礼部,在普天之下维护参与的是士大夫集团。《切韵》系统韵书支撑科举制度,有始有终。在世界古代史上,我们很不容易找到享有类似特权的官方发音词典。

维护传统制度与适应语言演变,两者的抉择成为传统语言制度的难题,到二十世纪都可以发现其遗踪。若是汉字汉文确实能不暴露书面语言底层的方言差异,无论日常写作还是科举试卷,只需要一个共同的字体、词汇、语法、文体而已。可是,“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语音演变),“九州之人,言语不同”(方言差异),“传写不同,文字差互”(抄刻本的文本流动性),单一的语言规范——虽然其细节历代有所更新——必然给参加统一考试的各地考生带来种种困扰和负担。南宋戏文九山书会编撰《张协状元》第二出有下面对话:

(生)尊兄高经?(净)小子诗赋。(末)默记得一部《韵略》?(净)《韵略》有甚难。一东,二冬。(末)三和四?(净)三文酱,四文葱。
(末)那得是市卖帐?①

在《张协状元》里,副净(丑角)扮演的是赴考诗赋进士的书生,戏文作者竟然把他塑造成背不起科举功令《礼部韵略》的人物。参加诗赋进士试的考生必须会背《韵略》是一个最起码的前提,而且宋元南戏的观众对韵目“一东、二冬、三江、四支”应该很熟悉,否则“三文酱,四文葱”不会成为打诨的笑料。诗韵被读书人视为基本功的这一风气,直到晚清还能看到,例如周作人(1885—1967)回忆自己的启蒙过程说:

我在小时候预备举业,每日写一张大字之外还抄《字学举隅》与《诗韵》,这个苦功用得不冤枉,在四十岁以前,上下平三十韵里的某字在某韵我大抵都记得清楚,仄声难免有点麻胡,直到现在才算把它忘记

① 钱南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页。

完了,《字学举隅》的标准写法至今还记得不少,——但是这有什么用呢?①

晚清科举进士科的制度规定从县试、府试一直到会试、殿试,每个阶段都得作一首试帖诗(五言六韵或八韵的排律)②。试帖诗韵仅押平声字,这就是“仄声难免有点麻胡”的原因。周作人在别的地方又说,“抄过《诗韵》两三遍”③,可见通平仄、背韵书是要下苦功夫的。若是《诗韵》跟现实中的语音基本一致,或者科举制度不要求遵守《诗韵》,预备举业的士子不可能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死记硬背。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下诏宣布自明年起废除八股文、试帖诗,韵书从此就失去科举功令的地位,作为官方语言的权威性一去不复返。之后由国音、国语、普通话开始承担起国家法定语言的资格,口语语音代替押韵平仄的知识成为代表个人文化素养的重要标准。

“科举语言”的影响不止于帝制中国的版图,甚至波及历史上完全没有实行过科举制度的日本。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中期,日本知识精英阶层(不包括专治西学的学者)的正式书面语言是“汉文(中国文言文)”,因此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的西化大潮中,中等教育课程仍然保留着讲授“汉文”的遗风。可是《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内藤湖南(1866—1934)在1900年发表报纸社论痛斥中学汉文教师之不学无术、汉文教学法的不得体而写道:“德川时代末年的汉学感染于明末文人的轻薄风气,把科举考生必备的兔园册子、草率成编的选本奉为金科玉律,还应用八股评点法评论一切古文”,结果训练出来的汉文教师只能阅读宽政年间(1789—1801)以后六七十年间的日本汉文以及中国唐宋到明末的议论文而已。此辈连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六国史”、镰仓室町时代的五山文学、江户时代前期的荻生徂徕(1666—1728)濠园学派著作等汉文作品也不会读,何况中国正史的诸志、明清的奏

① 周作人《谈〈字学举隅〉》,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05页。

② 蒋寅《科举试诗对清代诗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③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十四)杭州》,《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176页。

疏简牍、清朝当代的汉文书报,都无从正确断句,只得面墙而立^①。内藤对十九世纪日本汉学的严刻指责或许在一些地方超过实际情况,但在当时日本社会的汉文爱好者(一种“文化遗民”)群体中相当流行的吕祖谦《东莱博议》、谢枋得《文章轨范》、唐彪《读书作文谱》等原来都是举业启蒙之作,而这些著作的文法、章法往往影响到明治时代日文报纸等的论说文体,这应该是事实。既然如此,晚清张之洞、章炳麟、《国粹学报》诸人所鄙视的“东瀛文体”可否算作中国“科举语言”外流后跟西学结合产生的一种畸变态?

南宋杨万里有一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我想这诗句足以象征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事实:正字、韵书、科举功令严密地覆盖汉语基层的多样性,稳固地控制书面语言的单一性,甚至还给东亚“汉字文化圈”不断提示了中国语言的典范。

^① 内藤湖南《中等学校の汉文科》,载《内藤湖南全集》第3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年,第96—98页。

目 录

“学术史丛书”总序 陈平原/1

前 言/1

第一章 阅读韵书/1

第一节 支撑“中国、中华”观念的语言制度/1

第二节 韵书研究与语言制度史/3

第二章 《切韵》与唐代功令/7

第一节 产生韵书的技术、文化背景/7

第二节 陆法言《切韵》/10

第三节 唐代功令考/13

第四节 贡举对韵学的影响/22

第五节 唐代口语正音标准和《切韵》的地位/25

附录一 隋唐五代韵学年表/27

第三章 《广韵》与《集韵》/36

第一节 《广韵》与景德科举改革/36

第二节 《集韵》与古文复兴/44

第三节 《广韵》在南宋的复兴/51

本章小结/53

第四章 唐宋科举制度转变的方言背景/55

第一节 李涪《刊误》与乾符三年进士试/57

第二节 北方方言入声韵尾的弱化与

五代北宋进士试/63

第三节 进士科功令与方言分歧/67

第四节 从骈文到古文/78

本章小结/80

第五章 “韵略”的蜕化/83

第一节 宋代“韵略”与进士科诗赋试/83

第二节 毛晃、毛居正《增修互注礼部韵略》

——宋代道学的韵书/88

第三节 附释音本的流行和《押韵释疑》/100

本章小结/108

第六章 “中原雅音”与宋元明江南儒学

——“土中”观念、文化正统意识对中国正音
理论的影响/110

第一节 “中原雅音”的思想背景/110

第二节 “中原雅音”和宋元明江南道统/117

第三节 所谓“中原雅音”的性质/127

第七章 音起八代之衰

——复古诗论与元明清古音学/131

第一节 宋代诗学中的古诗用韵问题/131

第二节 朱熹“叶音”说及其影响/135

第三节 元代科举与“古韵”的制度化/139

第四节 明代复古诗论和古音学/140

第五节 诗学和韵学的乖离

——清代古音学的质变/145

第八章 胡蓝党案、靖难之变与《洪武正韵》/148

第一节 “今来科举既开,未审用何本为主”

——元代韵书的南北差异/148

第二节 “学士大夫束之高阁,不复省视”的韵书/150

第三节 《洪武正韵》七十六韵本、八十韵本的废兴/153

第四节 元明浙学与《洪武正韵》的编纂/166

第五节 胡蓝党案与《洪武正韵》/171

第六节 金华宋氏在建文年间的复起/174

第七节 靖难之变、解缙狱与《永乐大典》/176

第八节 应制与正字

——《洪武正韵》的用途/180

第九节 明朝遗民和四库馆臣对《洪武正韵》的态度/190

附录二 陈天祥《四书辨疑》所引元代初期南北
韵书异文考/196

附录三 《洪武正韵》同一小韵“重出切语”试释/199

附录四 明太祖诗韵谱/201

第九章 韵严“华夷”之辨/209

第一节 胡虏王制与华夏文物/209

第二节 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试与韵书的编纂/216

第三节 御定《音韵阐微》/220

第四节 似曾相识燕归来/224

第十章 清代鸿胪寺正音考/228

引言——有关明清时期汉语共同语的讨论/228

第一节 清朝宗室、旗人的汉语/230

第二节 鸿胪寺的正音

——朝会唱赞和直隶音/233